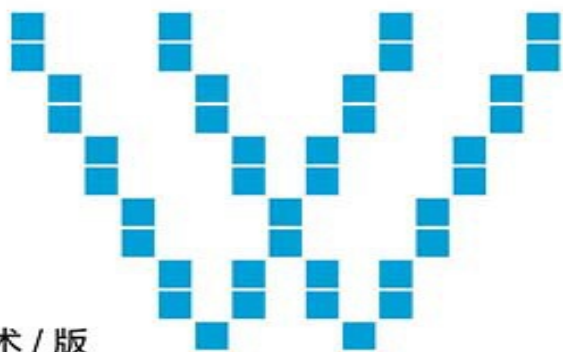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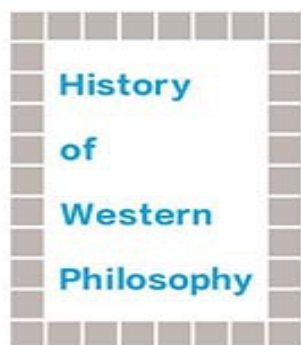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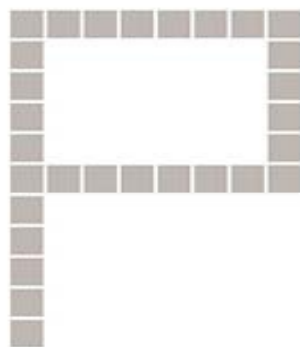
总论

叶秀山 王树人 著



西方 哲学史

学 / 术 / 版



叶秀山 / 王树人——总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西方哲学史（第一卷）——总论（学术版）

主编：叶秀山;王树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3

ISBN：978-7-214-24266-2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新版序言

叶秀山先生是我半个多世纪的同事、好友。不幸，他先行驾鹤西去，已经离世五年了。当下，在我为我们共同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新版写作序言时，叶先生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真是太怀念他了。我想，下面这篇序言，也是我对老友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吧。

在这篇序言中，我首先对“学术版”的含义，作些补充说明。所谓“学术版”，主要是区别于中国曾在相当长时间里流行的集体编书套路，如编普通教科书的套路。其表现为，先根据主题统一思想，再拟定出写作大纲，然后分头写作，最后由主编统稿。这对于普通教科书，也许可作为一种套路。但是作为人格独立和自由创新的学术研究之展现，上述编书的套路，是不可取的。

我们这套《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突出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参与本书的编者作者之独立自主性和自由创作之精神。据此，我们在选择作者时，很注重他们的专著研究成果的水准，包括有没有创新的独立风格等。可以说我们这套书，乃是诸位作者独立自由创作的一种综合。因此，在这套书中，能看出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新面貌和研究的深度，具有比较长远的学术价值。这套书能获得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不是偶然的。

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有一种对哲学史的看法很流行，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后来知道，这是对于黑格尔哲学观和哲学史观的一种概括性的体会。黑格尔这种观点，可以批判分析，但时至今日，它仍然包含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除了他用其僵化甚至公式化的体系框架，对哲学史强硬规范外，也还能明显地看到，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形成，确实得益于他对哲学史洞见迭出的深刻研究。事实上，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家几乎没有不重视哲学史的。因为，除了现实的科学与文化，哲学史乃是哲学发展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源头活水。

随着中华民族整体科学与文化水平的提高，读哲学史和哲学经典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精英们会感到，若要使精神丰富和境界提升，哲学和哲学史的修养，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今年是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应学会负责人之邀，我为纪念会写了一张条幅。我是这样写的：“哲思是提振精神的动力，可发现真善美，祛除假恶丑。有如春风唤醒大地之生机，瞬间呈现出万紫千红。”下面我对此条幅作些解释。首先，我这里用“哲思”，而没有用哲学。我意在使哲学动态化，打破对哲学变成僵化的单纯知识之见。因此，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之意，但又不完全归结此意。

当然，哲学家创作的哲学是哲思的产物。但是，若想学到种种哲学的知识及其思想，不可能像学习常识或数理知识那样现成地接受，而是必须进入一种普遍的“哲思”，才能创造性地学有所成。所谓普遍的哲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有怀疑精神，即当今

所说的“质疑”精神；其次，还要有批判精神。但是，真正的批判，不是单纯的完全的否定，而是“扬弃”，有如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那样，相继间既有否定，又有建设性创造性的思想推进和发展。“文革”式的批判，就是单纯的完全的否定，这无论对思想理论还是现实，都只能造成大破坏和大灾难。

这种普遍性哲思，对于个人而言，其所以有如春风唤醒大地生机的作用，是因为，对于能进入这种哲思的人，乃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启蒙。就是说，能使人从蒙昧状态的人性中觉醒，使人变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能够不断创新的人。如能认真阅读我们这套哲学史，咀嚼其中的章节，就能品味到普遍哲思带给人的自我启蒙味道。综观世界史，无论中西，人们都对专制独裁抗争反对不已，渴望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同。但是，为了维护专制独裁，统治者都用蒙昧主义愚弄和欺骗大众，不让他们觉醒。所以，哲学史所包含的质疑精神和扬弃式的批判精神这种普遍哲思，因其具有自我启蒙的作用，特别值得珍视和践行。

我们现在人类居住的地球村，正在面临被破坏乃至被毁灭的严重危机。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两个城市几十万人瞬间被毁灭。从那时起，这种人类危机就显示出可怕的征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其毁灭的力量已经发展到能瞬间多次毁灭整个地球的破坏威力。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追求技术进步的巨大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还在膨胀，当下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出现的智能机器人，从“阿尔法狗”屡次战胜世界围棋大师开始，已经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都在从过去延伸人的能力，发展到要以过去难以想象的高质量高速度，替代似乎日益显得萎缩落后的人类。从而，使人类陷入有可能被智能机器人淘汰的危机。据此，哲学家和未来学家，提出了“后人类”概念。

必须说，在当下，“后人类”是人文领域，特别是哲学领域，最值得重视的概念，也与我们这套《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相关。罗素曾把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史》命名为《西方的智慧》。可以说，他抓住了哲学的核心价值。哲学的产生，确实是人类智慧的重要提升。对于“后人类”危机问题的解决。哲学与哲学史能不能提供智慧呢？答复是肯定的。后人类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技术飞速发展中，如人工智能、核能、生物工程的使用等，是无限地放纵其发展，还是必须有所限制？显然，必须重视限制技术发展中的负面作用。从而使核能、智能机器人等不能变成脱缰的野马，变成淘汰现今人类的“后人类”。相反，必须让核能、智能机器人等永远隶属于人类掌控的为人类效劳的技术产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主奴关系”意识描述中，曾揭示主奴地位可能转变的现象。即当主人把自己一切生产生活需要，全交到奴隶手里掌控，有一天就会使奴隶地位转变成掌控主人的位置。今天，反思黑格尔主奴地位转换的描述，对比当下人类与技术关系有可能地位转变的问题，确实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并给我们以惊醒的启迪。

人类面对一切危机，都需要有智慧的智者现身。这些智者，包括作为思想家的学者和明理的大众，还有掌握国家大权的政治领导者。特别是后者，尤其重要。因其掌握国家大权，如果他缺少智慧，甚至是像希特勒那样好战的疯子，在目前的形势下，就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相反，如果各国领导人能倾听有智慧的思想家和明理大众的呼声，回到呵护人性的理性，否定一切战争的叫嚣，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村就还有救。对此，也有史可证。20世纪80年代，曾经以克隆术的实现，引发一次世界性的讨论，即科学有无禁区的大讨论。问题的核心是可不可以克隆人？后来，通过对于克隆人的后果具体分析，各国都认识到克隆人不仅能毁灭有史以来人类的伦理道德，而且随之也使人类整体文化毁灭。所以各国政府都一致声明，禁止克隆人。

哲学史是哲学的汇集，哲学这种精神产品，如同原创的艺术品一样，具有独创性。这种原创性智慧，其价值是永恒的。就是说，这种价值，永远具有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启迪。恩格斯曾经把读哲学史称为可以让思维得以锻炼的体操，也可以说是唤醒人们创

新思维的体操。因此，一切想要真正提升自己文化素质的文化人，似乎都有必要响应恩格斯的号召，一起努力耐心地研读哲学史吧。如何努力耐心呢？中国近世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借用三位大词人晏殊、柳永、辛弃疾词中的名句，具体描述了古今成就大思想家等一切有成就者的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三种境界，确实道尽了一切获得成就者的真实人生经历。

第一种境界指出，人要获得成就，必须独立不羁。在千难万险中，敢于居高望远，“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就是能够吃苦耐劳。为了达到目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指经过千辛万苦，最终能否取得成就，还有机遇问题。要在千回百转中，耐心追寻，时机一到，即刻抓住。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愿这套书的编者、作者和读者，都能牢记并领会王国维先生这一充满诗意深旨的殷切教导，在事业的创造中继续“独上高楼”，“衣带渐宽终不悔”，在耐心追寻中，能不断见“伊人”于“蓦然回首”。

王树人

于长白山脚下抚松锦江明珠1号楼观云斋

2021年11月7日

前言

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哲学

中国介绍、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迅速发展的时代，东西方哲学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碰撞日益频繁。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的职责是，要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成绩，对哲学学科在学术上有所推进。

本书的编者和执笔者都是长期从事哲学专业工作的学者，大家共同的心愿是要在这个多卷本项目的带动下，把自己的工作做一次小结，又在这项任务中，推进自己的研究工作，不仅使这个项目能够很好地完成，同时也使自己的哲学专业领域有所扩展，水平有所提高，这部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就是在这样一种专业的敬业精神指导下写作的。

本书之所以标出“学术版”，只是想告诉读者：这部书的各个部分都是作者经过独立研究的成果，是各位作者的研究心得。

由于用途不同，可用不同的方式来写书。我们这部书，当然也尽量照顾到不同的需要，企盼着各界的读者都能关注它，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学术性和研究性方面的。我们体会所谓学术性和研究性有下面几个方面须得注意。

一方面，我们注意第一手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也重视研究第二手的参考资料。我们的理论根据，当以第一手材料为主，这对于我们哲学专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经常强调的主要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是研读“经典原著”。我们的立论要求做到“言之有据”，这个“据”来自我们的研究对象。“经典原著”是客观地放在那里，人人得而读之，不是随便可以曲解的，因此我们的工作首先主张老老实实地读书，掌握第一手材料。

另一方面，我们也主张“创造性”地读书。“哲学”原本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历史上公认的“经典原著”，都是“创造性”的。教条式地读书，不仅违反历代诸贤哲的学术精神，也是违反这些著作的实际情况的。教条式地研究，表面上似乎是死死抓住“原著”，实际上反倒是失之交臂而南辕北辙，是很不客观的。

所谓“创造性”地阐发“原著”，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去“阅读”和“理解-思考”这些“著作”，而得出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当然，我们的“头脑”与这些原著作者的“头脑”是不同的。我们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我们的“头脑”是在“不同”的背景下“陶冶”出来的，因而在这些著作的启发下对问题的思考，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首先的“不同”在于我们是中国的学者。我们有自己的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传承，在哲学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思考方式。我们这些学者，不管自觉与否，都是在这种文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珍惜自身的文化传承和哲学传统。我们学者的任务在于以同样的创造性的精神来对待我们自身的哲学传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可以作出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可以在同等的哲学层次上与西方的哲学有真正的“对话”，而不仅是各说各的话。这样，我们在受命（接受这个项目）之初，就把“具有

中国学术特色”作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们这一代学者是生活在现代中国条件下的。现代中国从194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固然在一个时期有教条主义的偏差，但在事实上这种倾向已经逐步得到克服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同样创造性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过去所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对于我们的专业工作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开始研究哲学的朋友，我们经常建议他们重视学习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如果这个建议有意义的话，就我们自身来说，也是得自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潮中，我们这些做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自然就会重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据我们的体会，我们这个重点的选择是有收益的。就西方哲学专业来说，我们以德国古典哲学的训练为基础，上溯至古代希腊，下达于当今“后现代”诸家，欧洲哲学的主线应是可以把握住的。这条“主线”，也是哲学思想“创造性”的主线，以此种精神和学养作为背景，来进行其他断代或学派的研究，在思路应是比较通畅的。

这样，在现今世界讲“中国特色的哲学学术”，当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承的训练在内。这也是我们这套书的作者们所要着重致力的地方。

所谓“创造性精神”，也就是“自由的精神”，哲学本身就是自由的学问。哲学里的“自由”当然不是随意的胡思乱想。事实上一些即兴的偶然灵感，往往并不是“创造性”的，常常是已经被他人“创造”过了的。有些貌似“创新-原创”的“突发奇想”，或者甚至是精心构造出来的“体系”，很可能是“拾人牙慧”，真的“古已有之”。“创造性”也有自己的“传承”，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历史”；“创造性”的“历史”是一部“自由史”。哲学史也就是这种“自由史”的理论的表述。对于“创造-自由”的历史，我们也是要“学习-研究”的。“学习-研究”他人，特别是学习那些历史上的哲学大师们如何创造性-自由地思想，舍此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成为真正“创造性”的。

因此，编写这部多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目的也在于把西方历史上那些载入史册的哲学大家们如何创造性-自由地“思想”哲学问题真正客观地介绍给大家，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我们自身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只有“自由者”能够理解“自由”。

这个思路，也给我们这套书带来一些特点或问题。

读者或许会发现，我们的作品，各章各节的写作，都是独立研究的成果，因而很可能保持着独特的观点和风格，在相关的论述上会发现“不同”，甚至“矛盾”。作为全套书的编者，我们只要求一卷之内尽量避免矛盾的观点和论述，而不要求整套书贯彻同样的学术观点；就整套书来说，我们也只要求在编排形式上的统一，以便于读者阅读。

对于各执笔者，只要立论根据是经过认真研究，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我们都尊重作者的自由劳动，采取“文责自负”的办法向广大读者负责。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是想尽力避免过去“集体写书”的一些毛病。

当然，这套书也还是有它的整体性的，除章节的安排是按照历史的、自然的联系外，我们作为主编者，还写了一卷“总论”，给读者一个整体的观念，当然，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

这套书在诸位参与者通力合作下，近期将陆续出版。在这里，我们对于他们的学术水平表示敬佩，也对他们在这项工作中的精诚合作表示感谢。当然，我们也要对我们院和所的领导给予本项目的资助和支持表示感谢。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点项目之一。

我们尤其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的的大力支持。感谢他们对于我们这项难于投入市场的非产业性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些朋友们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关怀和智慧，使我们深受鼓舞。

叶秀山 王树人2003年8月21日于北京

上篇
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

叶秀山

一 学习哲学的态度和途径

（一）哲学之用途

通常认为“哲学”起源于古代希腊，是欧洲的一门古老的学问。这样的共识，不等于否定古代其他民族也有“哲学”的问题。凡有人类的地方，多少都会有“哲学”的问题。“哲学”所提问题，乃是人类精神的自然的趋向，是人作为有限理智者在理性上所能提出的“终结-最终”问题，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一种表现，是人人都具备的，只是表现的方式和执著的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叔本华曾经说，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就是强调人类精神这种穷根究底、追本溯源的特点。

然而我们应该承认，在世界上众多的古代民族中，只有希腊人把这些哲学问题推向了“学问-学科”的层面，也就是说，由于古代希腊的智者们的努力，“哲学”成为一门“科学”。我们说“哲学”为一门“科学”意味着它不是“宗教”，也不是“艺术”，更不是日常的经验“技术”——不是处理日常事务的应变能力，在这些方面，“哲学家”有时显得很“笨拙”。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被讽刺为“望天者”，他们只注意“天体”的运行，而没有注意眼前的道路，一脚掉进了泥坑里。讽刺哲学家的故事后来更是层出不穷。传说一位哲学家渡河，问船主懂不懂得哲学，听到否定的答复后，喟然叹曰，如不懂哲学，生活的意义去了一半。刹那间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船夫问哲学家会不会游泳，当听到否定的答复时，船主大呼，如果不会游泳，生命的意义就全部没有了。种种讽刺，无非说明“哲学”虽为“智慧”之学，而在实际的利害关头，哲学家往往并无“智慧”。

对此，我们只能以“大智若愚”来自我解嘲。我们说，日常所谓“智慧”乃是一些“小计谋”“小聪明”，而“哲学”关心的是“大事情”，讲的是“大智慧”“大聪明”。

就理性的智慧来说，一切从事专门的“科学”问题研究的人，都会在非其专门领域的“事情”上，显得有些“笨拙”，不那么“精明”，并不只是“哲学家”就会特别可笑些。

“智慧”的“大”“小”之辨，使我们想起庄子的寓言。传本《庄子》开篇《逍遥游》用各种故事说明“大”和“小”的区别。最后一则，讲惠子讽刺庄子的话，“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并以大树“樗”作比喻，这种树“不中绳墨”，连木匠都不会看它一眼，就像大众不会爱听某些哲学家的话一样。庄子也以寓言反驳道，狸猫倒是很小了，东蹿西跳，掉进了陷阱，“死于网罟”；而大鼈牛要它速耗子固然不行，但是它也中不了机关，掉不进陷阱里，而那棵大树，因其大而无用，“不夭斤斧，物无害者”，你可以经常在大树底下乘凉，“逍遥乎寝卧其下”，“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大用解决大问题，小用解决小问题；大用持久，小用短暂。这是庄子要阐明的意思，这个意思，跟古代希腊对于哲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哲学”好像一棵“大树”，在人的精神世界生根成长，因其“大”而不能、不必-更不舍得“用”，“大材”不能、不必-也不舍得“小用”。所谓“舍不得”，乃是“珍惜”它的“（大）用处”，不轻易用它。西方语言很难找到对应“舍得-舍不得”的语词，可用英文的“save”理解。“save”有“救”的意思，用在这里，也很恰当。“树”“牛”因其“大”，而得“救”——庄子所谓的得（享）“大年”。

我们看到，“哲学”比起其他科学-学科来说，真可谓得（享）“大年”了。

当然，“科学”都具有跨越时间的特点，某种意义上来说，“物理”“化学”等学科，竟然可以是“永恒”的，不会有哪一天说“物理学-化学”这类科学“过时”了，但是“哲学”的情形又有不同。

科学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持久的，而哲学在具体的意义上也是持久的。

大概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作为一本书来说，主要只有“历史”的意义了，做科学史的会重视它，但没有人再从这本书开始学习平面几何学。但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就不能做这种论断。迄今为止没有人敢说他们的著作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没有理论的意义了，也就是说，没有人敢说学哲学的可以不必读他们的著作了。并不是说他们以后的大哲学家没有作出新贡献，恰恰相反，每一个称得上真正哲学家的，都是创造性的；也不是说后辈有些人修养高，特别谦虚，不忘前辈人的劳绩。不是的，我们看到后来许多的哲学家都在“批判”他们，有的态度还很激烈。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影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生命力”，它们继续“存活”，的确是“大命-大年”了。

“哲学”因其“无（小）用”而“命大”，得享“大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二）哲学作为“自由的知识”

“哲学”之所以有这样持久的意义，是因为在根子里它并不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科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次上，为“实用”服务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定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的必需。

那么，在“科学”方面，古代希腊人的贡献何在？

在人类历史上，古代希腊人使得一种科学性的思想方式得到了自觉的运用和发展。这种思想方式，并不完全受眼前的实用功利所支配，在形式上采取了客观的态度，使世界成为“对象”，对它进行观察、思考和研究。相对于那种狭隘的功利态度言，它是“自由”的态度，“静观-客观”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自觉运用下，使得“科学-知识”成为不同于受制于眼下功利的“技术-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精神第一次摆脱了狭隘功利态度，成为“自由”的精神。

这种对待世界的客观自由态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巨大利益，正说明了当精神摆脱了急功近利而得到“自由”发挥后，反而具有更为远大而深远的功利，舍“小利”而得“大利”。我们很有兴味地看到，庄子的思想在欧洲的历史中得到了证实。

然而，这种自由的知识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希腊一句成语，叫作“悠闲出智慧”。关于“闲暇-悠闲”近世有许多的研究，从社会生产能力方面指出人们只有在一定丰富的物质生产条件下，才有“闲暇”去从事精神文化方面的活动。这当然是很正确的。就哲学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应用了这层意思，我们在他的《形而上学》里读到：“最初人们之所以惊赞感觉上非同寻常的技艺，或许并非仅因其实用价值，而是因其有与众不同的智慧；随着此种技艺之积累，其中有的为适应需要（必须），有的则是适应休闲，而后者总是被认为在智慧上比前者要高，因为它不是为了有用。一旦在这些技术充分发展后，那些既非为了必须，又非为了愉快的知识就会出现，而此种知识首先会在人们有闲暇的地方出现。因此，关于数学的技艺，首先在埃及出现，因为那里的僧侣享有闲暇。”^注

就“闲暇”对人们思想方式的意义来说，乃是提供了一种摆脱眼下实用功利、对世界作客观研究的可能条件，“闲暇”保障了人们的“自由”。当然，有了这种保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拿来作科学的思考研究，也可以做艺术的创作，做体育的锻炼等，也并不排除出现懒汉或精神不正常者。如何利用这种“闲暇”，自然也是有多种可能，而且当社会为了“保障”一部分人（往往是少部分人）的“闲暇”而“剥夺”另一部分人（往往是大多数人）的“闲暇”权时，双方都会受到“扭曲”。有“闲暇”的人因长期（有的是几代人）的懒散而成为白痴；有的则因过于胡思乱想而患上精神分裂，或孤独而精神郁悒，等等，这些都已成为小说家的素材。

古代希腊人体魄健全，他们把这种“闲暇”的自由用于哲学、数学、科学和文艺、体育。人们不仅仅为了划分地界而测量，人们也不仅仅为了调节而娱乐，“自由”的精神进入科学和艺术，改变了它们的性质，提高了它们的品位，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部门。

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源于“好奇”。他在《形而上学》里说：“最初人们通过‘好奇-惊赞’来做哲学。”^注

亚里士多德这个意思现在容易仅从一般心理上来理解，这样就比较粗浅了。好像人这个动物常怀有一种“好奇心”，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人们对外部的世界进行探索，好像世界有许多秘密，要我们来揭秘，然后人们就从事科学的研究探索。这样来理解当然也并不错，只是嫌浅了些。这样浅显的意思，不待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智者来说。

其实，在古代希腊那个时代，“好奇”也是一种“奢侈”——有“闲暇”的人、配享“自由”的人才配享“好奇”。“好奇者”乃是“自由者”。当其时也，“好奇”就是“自由”。于是，“知识-智慧”源于“好奇”，就等于说，“知识-智慧”源于“自由”，这层意思，也就只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体会出来。在这层意义上，“好奇”就不仅仅是一般心理上的，而是哲学上的，精神层面上的意思了。

我们还可以追问下去，所谓“好奇-自由”的精神，还含有什么样的意思需要阐发出来？

我们前面说过，“闲暇-自由”乃是（暂时）摆脱眼下狭隘功利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主动”的，不是“受动-被动”的，而“实用”“功利”，则常常是“被动”的。

在古代，实用功利的被动性是很明显的，是人人都能感到的一种压力，一种“挑战”。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抵御自然的灾变，用各种技术避风雨、保温暖，寻觅或猎获各种食物以果腹，人们要利用、改造环境以适应自身的需要，而“需要”意味着“被动-被迫”，也意味着“匮乏”，满足需要即是填平“欲壑”，“空洞”填平了，融融自乐。

“自由”精神正是意味着摆脱了当下实用功利，则可以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好奇心”，尽管这种“好奇心”并不排除客观“对象”的诱发，因而并不完全排除感觉经验，如“印象”等心理过程。古代希腊哲人们建立的“知识学-智慧学”仍然具有感觉经验的因素，但却排除了“欲望-欲求”。

当然，“好奇心”也是一种“欲望-欲求”，“求知”也是“欲求”，也是出自一种“缺乏”——“缺乏”“知识”；然而“求知”毕竟不是“谋利”，而且大多数情况也不是“曲线谋利”，并非为“学而优则仕”所驱使。对“知识”的“自由”态度，乃是“（求）知识”本来的目的。

“知识”一般情形下当然可以作为“工具”来使用，可以作为生存（谋生）的手段；然而“工具”有大有小，“自由”的“知识”在古代希腊是一种“大工具”，而不是“小工具”。

在这里，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分“工具”的“大”“小”？我们说，如果可以“增进”我们的“经验”，在实用功利上能够有所改进，那么我们就说它是“小工具”，有“小用处”；而如果是在精神上，在超越的意义上能“促进”人们的思考，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而在适应环境上反倒并无什么直接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精神文化——包括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艺术等，都是只有“大用处”，没有“小用处”，因而是“大工具”，而不是“小工具”。中国人常说“大器”“大才-大材”，固然有一层褒贬的意思，如果说的是学理上的事，那么这里“大”和“小”，就是突出了哲学的意义，或许可以做“经验”和“超越”这样的形而上的理解。

日常经验中当然也有好奇心，只是这种好奇心常受物质欲求的驱使，最终注意的是与我们日常物质生活有关的问题，因而这种好奇心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限”的。而所谓“有限-

受限制”，相对而言，也就“小”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小好奇心”；而纯粹精神的“好奇心”乃是“大好奇心”，因为它不受物质的欲求所“限制”，乃是“无限”的“好奇心”，也就是“自由”的“好奇心”。

于是，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意义上，在经验的意义上，我们并没有“权力”问“哲学”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问这个问题是“不合法-不合适”的；如果一定要问，我们只能回答，在这个范围内，“哲学”并没有什么“用处”——不管吃，不管喝，也不好玩，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既非必需实用，也非使人“愉快”的。

然则，人们对“哲学”问题，有“大”“好奇心”。

哲学问题的追问，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这是海德格尔说的那个“Ereignis”。海德格尔这个词，有多种翻译，我们在这里把它译成“大事”。这个词一般有“事件”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event”。但是德文还有更多的意思，我们在这里为强调与上述“大”相联系，理解为“大事”，但未将“eigen”的意思表达出来。我们不妨将经验事物的属性理解为事物的某些有用-实用方面，而谈到“大”，就是完整的“事物”“自己”，在“物”在“我”，都是“自己”，以“自己”对“自己”，各自都“自由”，则不是实用功利关系网中的“环节”。

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大好奇心”？

“小好奇心”是“小事情”所“引起”的，那么“大好奇心”就应该是“大事情”“引起”的。什么是“小事情”？按上述理路来说，举凡一切直接间接受实用功利制约的，被理解为“小事情”——并非说它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有时候比所谓的“大事情”更重要；只是在相对于“大好奇心”之“无限”而言，它是“小”的，而“大事情”并不受实用功利之左右和限制，这种“摆脱”实用功利的事物，乃是“自由”的事物，正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身-事物自己”。凡对“事物自身”有“兴趣”的，乃是“大好奇心”，这个“事物自身”也就是“大事情”。

从这个意义来看，“大好奇心”和“小好奇心”都是“被”“吸引-引起”的，因而好像都是“被动”的，其实这两种“吸引-引起”之间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小好奇心”为事物之有限属性所吸引，在感性的层面；“大好奇心”为“事物自身”之无限性所吸引，在理性的层面，是被“理性”自己“吸引”出来的。

按照康德的哲学，“物自身”不提供“直观形式”，因而是纯粹理性的，对于我们的感觉经验来说，“事物自身”永远是一个“秘密”，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大好奇心”为“大事情”所“吸引”，不是“被”一个具体事物所吸引，乃是被“问题”所吸引，而“问题”只能是由“理性”提出来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好奇心”为“大事情”所吸引，是为“理性”提出的“问题”所吸引，这样，就是“理性”“自己”“吸引”“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表面上看“大好奇心”是“被动”的，而实际上它却是“主动”的。“大好奇心”是“理性”自身提出的“问题-大事情”所“激发”出来的，因而是“理性”自己“激发-提出-涌现”出来的。于是，我们看到，所谓“大好奇心”乃是“自由理性”的“纯粹主动”。

从康德开始，这个“纯粹自由”的“理性”，就已经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在康德的哲学里，“理论理性”固然是有其能动性的功能（Vermögen），但是仍没有完全摆脱“接受性”的限制，“理论理性”是“静观”的，它的“对象”是理性自己设定的“现象”，而不是“事物自身”；理性要完全摆脱“理论理性”的“接受性”，必须进入“实践”的领域。这个“实践”领域，不是“感性欲求”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是比“理论理性”更为“低级”的“被动”领域；而康德的“实践理性”，不但要彻底摆脱这种“非理性”的“感性欲求”，而且是

连“理论理性”的那种受制于自身建立的“对象”的被动性，都在“克服-摆脱”之列。这个更高层次的“主动”的“理性”，在康德是为“实践理性”，亦即“意志”。

“意志”在康德是“理性”的，因为它完全与“感觉经验”“无关”，这就是康德的“意志-自由”的思想，亦即他的“道德动机”“职责”“德性-幸福”之二律背反等道德哲学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康德的“实践理性”引向“宗教-基督教”，“基督教”“信仰”在“实践理性”找到了“根据”。如果说“道德行为”乃是一种“绝对命令”——无条件地“令人”行动；那么，对于“天国（德性与幸福之和谐）”的“信仰”，就可以是“大好奇心”的一个表现。或者说，“信仰”与“知识”之不同，在于“知识”“满足于”“小好奇心”，而“信仰”“满足于”“大好奇心”。“信仰”乃是“超越”的“好奇心”的“满足”。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充满了“奇异”，只有那“理论理性”“管辖”的“领域”一切都是“合理”的，是可以“推论”的“必然”世界，无“奇异”可言。只要勤奋学习，没有不可解的“谜”。

然而人世沧桑，世界上许多事情是不可“推论”的；或者说，不是通过“推论”就可以“知道”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揭示了“德性”和“幸福”的不可“推论”性，指出它们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世界上充满了“缺德有福”和“有德无福”的“荒诞”现象。这种“荒诞”，在现实的世界不可能得到完全“合理”的“解决”。这个“荒诞-奇异”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大好奇心——而这种现象也是由于其“不合理”为“理性”本身提出的问题-疑问，而在康德看来，“宗教（基督教）”提供了一个“解决”的“样板-模式”。为“解决”这个问题——为“平息”这种“好奇”，“理性”必然要“设定”一个“德性”与“幸福”的关系“合理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德性”与“幸福”有了“必然”的“推理”关系，由“德性”就可以“推论”出“幸福”，反之亦然。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得到了“统一”，“理性”本身不再“分离”。这个（完全合理的）世界，康德说，就是基督教的“天国”。这就是说，只有这个（对）“天国”（的信仰）可以“满足-平息”“理性”这种“大好奇心”。

“平息-满足”“好奇心”乃是对“奇异”有一种“理解”。“好奇心”要求“理解”，要弄懂为什么会如此，原本也是“理论性”的。“天国”的“设定”同样也是对于尘世间之一切“荒诞-奇异”的事情有了一个“理解”：在尘世间，“幸福”和“德性”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而到了“天国”，才会是“必然”的；而“天国”的设定，伴随着“全知-全能-全善”之“神”的设定，他老人家洞察秋毫、烛照万年，人世间时间绵延中种种磨难——包括种种不合理、荒诞之事，皆是回归“天国-神城”之种种“考验”，这样尘世间那些“荒诞-奇异”之事，都在“天国-神”的光辉下变得“可以”“理解”（也就可以“忍受”）起来。

有了这种“信仰-信念”，再来看我们生活的这个（尘）世界，它就会“开显-显现”出“另一种”“样子”——即不同于“理论理性”面对的那个“经验（表象）世界-知识世界”，这就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所描述的“美-艺术世界”和“目的论世界”。我们在“艺术”和“目的”世界，看到“天国”的“投影”，亦即在艺术和目的世界，我们看到了“最高-纯粹理性”的“例证”。于是，艺术和目的世界，处处体现出“神”的“踪迹”-“奇迹”，大到天体之运行，小到花蕊之绽放，无不展现“巧夺天工”，“匠心独运”，闪烁着“最高创造者-创世者”之“荣耀”。

然而哲学毕竟不是宗教，既不是宗教的“婢女”，也不是宗教的“法官”，但它却要将宗教在“理性”面前“审”出一个“理路”来。“哲学”以“理性”自身的方式“平息-满足-化解-消解”这种“大好奇心”。这就是后来从费希特经谢林到黑格尔完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道路。这条道路，把哲学从被康德偏离了的路线上又拉回到希腊的传统上来，以“绝对理

念”来“回答”“大好奇心”所提出的问题。黑格尔以“思辨理性”为基础，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以“绝对精神”的王国作为“理性”的“家园”代替了基督教的“天国”；就历史的眼光来看，乃是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问题“（思辨）理性”化，成为一个辩证的概念体系，使“哲学”又成为一门（不同于经验科学的）“科学-知识”。“哲学”成为“超越”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就成为“现象学-开显学”，成为“意义学-释意学-解释学”。

尽管“思辨理性”也有“静观”的局限，但是康德“自由意志”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能动性”问题仍“吸引着”哲学家的“大好奇心”而未被完全泯灭。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被认为过于概念化，过于静观而不够“能动”。叔本华的哲学要把康德的“意志”论推进到“原创”的地位，使其不落入“理性”的概念体系，而康德划清了“实践理性”的“意志”和“感官欲求”的“需要”之间的界限，提供了叔本华“意志论”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欲望”的思想基础。这样，就出现了既非“理性”而又非感官欲望的“原始-原创”性的叔本华式的“意志论”。

在这里，和我们的论题有关的是叔本华这种“意志”之“摆脱”经验实用之功利性。“意志”而又“无（实用）功利”，在经验世界乃是一个“矛盾”；但是在哲学意义上，不但是有理路的，而且是重要的。叔本华的“意志”无关乎“小功利”，而有“大功利”在。

在这里，又如何区分“大功利”和“小功利”？“小功利”为外界环境所支配，即使出自“内在”“需要”，也是为“物欲”所“驱使”，饥餐渴饮，冬暖夏凉，诸如此类，人为物役。这种意志为“需要”，在这种意志策动下的行动，是为了满足“需要”，因为“匮乏”而“需要”行动。这种“意志”就被叫作“饥饿的意志”或“意志的饥饿”——“意志的匮乏”或“匮乏的意志”，实际上也就是“缺失的意志”或“意志的缺失”，也就是“意志的（虚）无”和“（虚）无的意志”。

真正的“意志”不是“匮乏”而是“充溢”。这才是叔本华（以及尼采）所谓的“意志”。“匮乏”的行动是“被动”；“充溢”的行动是“主动”。“匮乏”的行动表面上是“物”为“我”用，意志的目的是要外物适应我的需要，亦即“填补”我的“欲壑”，而实际上却首先要“我”去“适应”外物的特性和规律，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特性面前，“我”的意志也是“被动”的、“接受性”的，而“外物”作为“客观对象”是“坚硬”的。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被动意志活动的结果，竟然会是“外物”把“自我”“吸收”进去。在这种行动中，“自我-人”固然“改造”了“外物”，同时“外物”也“改造”了“自我-人”——“自我-人”成为“有知识-有技能”的“人”，亦即“科学的人”，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谨慎”的人，而不是“自由”的人。

“充溢”的意志，其行动纯粹出自“意志”之“主动性”，是希腊哲人说的“流射”，黑格尔说的“外化”，是“精神-意志”“向外”之“开显”。“精神-意志”“走出”“自己”，与“外在”的“异己”“交往”，固然要“知道-摸清”对方之“习性-特点”，但并不“失去”“自己”，而是在与“异己”的“交往”中“保持”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精神”不仅在“自己”中，不仅仅“自身”“同一”，而且也还在“异己”中，使“异己”与“自己”“同一”。也就是说，“精神”在“异己”中“见到”“自己”。此其时也，“异己-外物-客体”“开显-显现”出“不同于”“外物-客体”作为“客观对象”的“意义”。

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现象学”和“解释学”，在“充溢-主动”的理论中，得到了坚实的基础。“哲学”作为精神性科学，就表现为“现象学-解释（释意）学”。

从这里，我们看到，由叔本华、尼采所强调的“充溢”性“意志”固然对黑格尔哲学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尤其是尼采，否定一切超越意义的存在，走的是另一条哲学道路，但是他

们的问题仍在同一个哲学层面，他们的“自由意志”必须与日常意义下的“匮乏”“意志”作原则的区别。只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并不是因为是“理性”的才是“自由”的，而恰恰因为是“非（不是）理性”的，所以是“自由”的。不过叔本华为求“解脱（这种意志）”，重新把“理性-理念（世界）”接纳进来，而尼采永远把“理性-理念”拒之门外，哲学的旨趣的确和黑格尔大不相同了。

就我们的论题来说，这种“充溢”的“意志”，无论是“理性”的，或是“非（不是）理性”的，作为“行动”的“动力”，乃是“纯粹主动”的，不是“迎接”“外在-内在”的“欲求”的“挑战”，相反的是对内外“欲求”——“感性欲望-需要-匮乏”的“主动”“挑战”，它是“挑战者-肇事者”而不是“应战者”，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在这个“主动”的意义下，“意志-理性-精神”“主动”提出“问题”——提出“疑问”，“主动”进行“探索”（行动），进行“思考”。哲学并非因为“匮乏-需要”而进行“思考-思想”，乃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思考-思想”。“哲学之思”并非仅仅由一切“有限事物”“引发”出来的，对于大千世界之具体研究，并不保证一定出现哲学思想。由“小好奇心”驱使的科学研究，需要一个“飞跃”才能进入“哲学”。“小好奇心”的日益膨胀以及经验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也并不能保证一定绽放哲学之思。哲学之思需要的是“理性-精神”的“自我-自己”“觉醒”，亦即“理性-精神”之“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迎接”“理性-精神”自身的“挑战”。大千世界的一切“挑战”，比起“理性-精神”自身的“大挑战”来说，只能是“小挑战”。“哲学”“迎接”“自由”的“挑战”。“哲学”追求“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哲学”的精神，是一种“永远追求”的精神，即使当物质的生活需求满足以后，哲学仍然在“追求”什么；或者说，在一般情形下，只有当“匮乏”的“饥饿意志”“填饱”了以后，真正的“哲学”“追求”才开始，也就是真正的哲学的历史的开始，哲学自身历史的开始。

正由于哲学的追求，哲学的“大好奇心”，并非由“有限世界”所“诱发”，因而不是“被动”的，而是“理性-精神”之“主动”之行动，“理性-精神”对于眼下的世界，往往会表现为一种“否定”的态度。“理性”这种“否定”精神，意味着“理想”与“现实”的经久的“矛盾”——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永远对“现实世界”说“不”。

“理性”的“否定”精神在哲学意义上并非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它引向更高的“肯定”。哲学追求的“理想性-理念”导向更高的“现实性”。

在哲学的视野中，世间一切都会、也都在“变”，“是”与“非”——“存在”与“非（不）存在”都在“流变”之中，在“时间”之中。这种实际的情况，为哲学的否定精神提供了根据。正是哲学的精神，在“存在-是”中看到“不存在-非”，而在“不存在-非”中看到“存在-是”。

这种“超越-超然”的态度，中国传统叫作“居安思危”和“处变不惊”。这两句中国的老话，体现出来的哲理，却是很深刻的。

身居太平盛世，享受安康，乃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沉湎于“安乐”，却并非好事。就个人来说，“闲暇”多了，无所事事，常会“无事生非”，不是闹事，就是生病；发生危机，遇到天灾人祸，呼天抢地，设法迎接挑战或躲避灾祸，也都是“自然”的事，然而陷于悲痛不能自拔，不能“节哀顺变”，然后尽力克服灾祸，不是精神崩溃，就是身体垮台。凡此种种，哲学都引导人们采取表面“相反”的态度，面对“现实”，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而不限于“片面”。